



後實證論與公共政策之研究：由社會科學方法論談起

◆ 蔡勝男

(國家文官培訓所 專員)

壹、前言

何謂世界觀¹(viewpoint of world)? 它是人類觀察事物的信念，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世界觀，因而對宇宙的看法呈現不同的觀點，人類經由各種不同的世界觀想像、觀察、體會，顯現出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圖像，瞭解不同世界觀的意義之後，吾人即可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對同一件事會有不同解釋的原因，例如，發生太陽發生日蝕的現象時，印度人會認為將有災害來臨，馬來人認為幸運之神即將到來（江明修，1997：13—14），同一件事情的現象為何會產生這麼大差距的世界觀呢？其實是因為人類心靈的那一扇窗開啟的角度不同所致。

人類會產生各種不同世界觀(viewpoint of world)的原因，在於人類的眼睛除了可看見事物之外，還會觀察不同事件(events)、物體(objects)之間的差異，經由視覺、記憶、聯想、關連、語言與符號的表達，將所見事物加以詮釋(interpretations)，因為每個人的詮釋不同，於是產生不同的看法，產生這個結果最大的原因就是觀察(observation)。韓森(1958：4-30)在《發現的方式》書中提到，微生物學家在顯微鏡的技術觀察事物仍會發生各種爭議，因而產生不同的觀察結果？這受到什麼因素影響？其主要原因在於不同的觀察者各自擁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觀察者，雖然看見相同事物後，但卻有不同的感覺詮釋，為何會產生這不同的結果，主要的原因有下列二項：

一、相信什麼，就看見什麼 (Believing is seeing)

因為我們受到以前個人的經驗(experiences)、概念(concepts)、理論(theories)、知覺(awareness)、語言(language)、符號(symbol)等影響，建立自己的世界觀(view point of world)，當看見任何物體(objects)、事件(events)

¹ 世界觀指，採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世界的各種不同見解的總稱，由認識論的角度解釋，有實在論、觀念論、唯象論及不可知論等；由本體論角度來看，則有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平行論、目的論及機械論等；由評價的角度觀察，則有樂觀說、厭世說及改善說等（商務印書館，哲學辭典，1988：74）。



時，就會在自己建立的經驗中，找出相關的資訊(relevant information)以認知(cognition)、闡述(interpretation)，因此，吾人就會產生相信什麼就看見什麼的情況。

二、看到什麼，就相信什麼(Seeing is believing)

這個觀點，告訴吾人的重點是，看得見才相信實體的存在，看得見實存固然是好，但是，看不見的事物並非不存在或不可信，例如，愛因斯坦發明相對論的理論，其時(time)、空(space)的觀念，雖然無法讓我們看得見，但其發明的理論卻可以被認同(identify)，因此，真實的世界不是只有看得見的才算是可相信的事物，有很多看不見的卻是存在的。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是從對世界的認知開始，針對世界本體的認識與瞭解，可以啟發研究者對於觀看世界不同方法的包容心。由於人類各種不同族群之間的世界觀 (viewpoint of the world) 太過多元與分歧，不同世界觀的人對於事情的解讀也為產生南轅北轍的差距。由於世界觀的不同，認識世界的面貌就會變得不一樣，認識世界所採取的方法也就會大不相同。所以，對於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會有一樣的方式和手段，最後其研究的結果當然是大異其趣了。

貳、人類研究事物的邏輯

方法論一直都是做研究的基礎，研究者如具有方法論的基礎，在研究的過程中，必可把握住研究的重點與方向。Gareth Morgan (1983:19) 在《超越方法》(Beyond method) 書中指出，研究者的「研究策略」，對研究者而言，不只是方法論的問題而已，因為方法不只是過程，也是提供解決研究問題的方式，方法的選擇對任何一個研究現象而言，已經帶來了它明確的假設，或指出問題的答案。換言之，我們對所要研究的對象已經有了明確的概念，或已經有研究想做的構想，對研究對象已有相當的瞭解，因此，可由研究策略的邏輯看出，研究者的世界觀、對世界認知的假設與解決問題的方法，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形成一種網絡，而這種連結，深深的受到研究者所持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之間連結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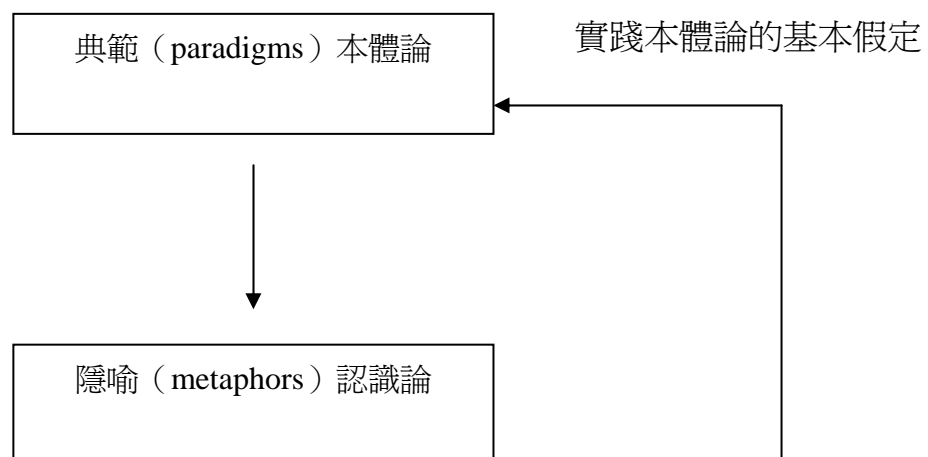
Gareth Morgan (1983:21) 提出一種研究策略邏輯的分析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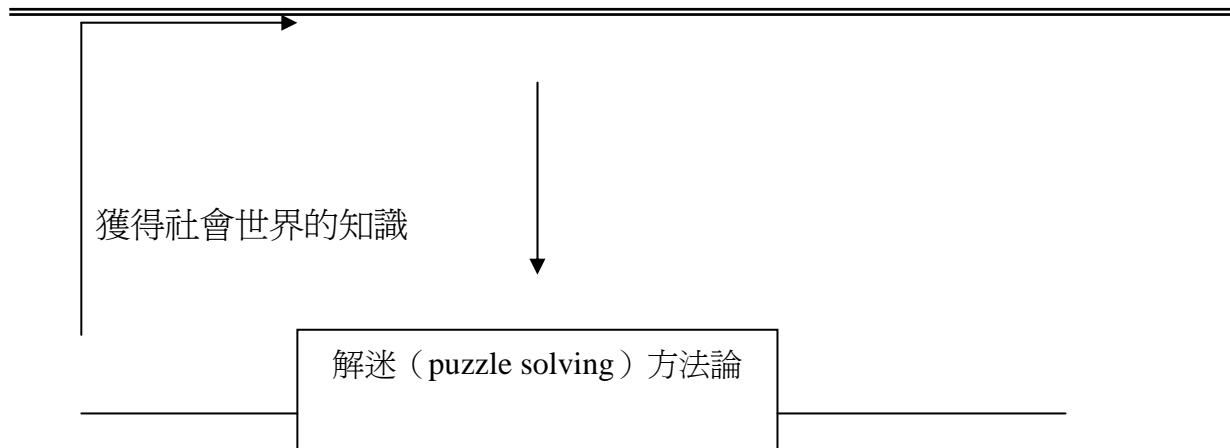
一、基本假定（典範 paradigms）：指人類本質和本體論的假設及研究網絡的策略，經由研究者對其生活世界和人性相關假設的認同，影響研究者對社會研究的觀點，透過此研究策略邏輯，提供研究者實務研究基礎，經由研究者的眼光、觀看以及共同認同的典以範解釋世界。

二、認識論的態度（隱喻 metaphors）：指科學知識是由研究者具體的研究假設所型塑的，經由研究者對社會現象、隱喻的研究觀察，以建構社會研究的技術與方法，據以引導研究者達成社會研究的成果，對於研究者不同的假設、想像、偏好的認識論的態度、洞察力、瞭解和解釋等方法的運用，據以獲得得各種不同的社會知識。

三、喜好的方法論（解迷 puzzle solving）：指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調查研究，並提供測量社會現象的基礎方法，由此獲得各種不同的社會知識，方法論是解答社會各種問題的設計，它搭起研究社會現象與現象本身之間的橋樑，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即在連結研究者與研究情境、說明、規則、程序和計畫綱領的一種連結，它是一種操作化的網絡設計，具體表現在研究者本體論的基本假定、認識論的態度及方法論的偏好上。

由 Gareth Morgan 研究策略的邏輯架構分析瞭解，本體論的典範是上層的思想基礎，指導研究者本體論的世界觀，認識論則指導研究者如何認識世界的知識，喜好的方法論是解除迷津的方法與技術，指導研究者各種研究的情況、說明、規則、計畫綱要，實踐研究者本體論的基本假定和認識論的態度，因此 Gareth Morgan 認為，研究策略邏輯是嵌於上述的所有要素之間的。





圖一：研究策略的邏輯層級架構；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社會科學的研究極為廣泛，所有人文現象都是社會研究的題材，例如，文學、藝術、哲學、思想、科學、宗教、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家庭等皆屬社會科學研究的範疇，社會科學研究的特色並不在於其研究的題材，而是在於它所建構的理論觀點（theoretical viewpoint）以及用來研究人文社會現象的視角（perspective）；換言之，社會科學理論的特徵即指運用、選擇、蒐集、安排資料的社會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黃瑞祺，1996：3）。

陳秉璋（1991：1）認為，每一種理論就本質而言，只是代表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展示而已。但是；其理論的內容、性質、形式，代表研究者方法論的立場。所謂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探討社會科學之所以為何以及如何成為一門學科、領域、知識以及科學的方法。社會科學理論的方法論，即是建構社會科學理論的邏輯、意義與性質的方法。

參、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與方法論

顏良恭（1994：83-84）指出，勃羅與摩根在研究社會科學理論也經常提到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問題，他們使用主體與客體的研究途徑，分為四組基本假定：即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方法論。在四個基本假定之間的關係，前三組的假定直接影響方法論，每一組皆會影響研究者探究與獲得知識（investigate and obtain



knowledge) 的方式，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的觀點，迫使社會學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論，以分析社會科學性質的基本假定，如圖二所示：



圖二：社會科學性質的基本假定

資料來源：Gibson and Burrell G.Morgan, Sociological Paradigms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19): 3; cf. 顏良恭, 1994:

85。

一、本體論

本體論係指討論被調查對象的本質 (essence) 為何的學問，如果指的是其形狀或其他概念的比較，則為實在論 (realism) 的主張；若是指其名字或標籤，則



為人類意識之下的產物，則為唯名論 (nominalism) 的主張。而本體論又可稱為實體論，它指研究實存本體終極的本性為何的學問，其意義可分為二項：(一) 廣義的本體論，指研究所思考者所認識者的實在本體的本性為何？此時本體論與形上學或純正哲學無異；(二) 狹義的本體論為宇宙論，指研究萬有事物之間相互的關係，但不涉及萬有事物的本性為何的研究？(商務印書館，哲學辭典，1988：118)

二、認識論

認識論係指，討論什麼可被視為知識或事實 (fact)，以及知識如何能夠成立？其性質為何？如何在批判的與經驗性的知識之間作區分？知識的驗證標準如何？知識在日常生活如何被傳播與瞭解，因此，認識論即指研究各種可能的學問，可分為三種不同的論點：

(一) 屬心理的，指認識乃後天形成的，其源自於經驗，經驗是結合一切感覺、知覺以成的，結合無數的經驗以成科學，這是心理分析的認識論；另外，認識乃在於先天的，其起源在於思考，以思考推闡原理成為科學的認識論，稱之為合理論；

(二) 屬論理的，即批判認識的本性由此定其價值產生觀念，它認為一切認識的結果，不能得外界事物之真，雖屬客觀的認識，仍為認識者主觀的作用，此認識論稱為觀念論或現象論，但是，主張認識即精確摹寫客觀事物的則為實在論。

(三) 屬形而上學，限定認識之範圍，可分為內在論或超絕論，如果認識可達經驗以外者稱為超絕論，認識即是經驗的稱為內在論 (商務印書館，哲學辭典，1988：857-858)。

三、人性論

人性論指，研究者研究人類自身本質 (nature) 的信念，因為信念引導個人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自由意志論者 (voluntarist) 認為，人性是積極的、自主的、不是被決定的；決定論者 (determinist) 認為，人類所作所為無一不被因果趨動 (causal forces)，不被環境或被遺的傳基因所決定。

四、方法論

方法論指研究者專注於客體的類推、預測與解釋；採用律則的 (nomothetic) 方法則為實證論。後實證論的研究者，則強調從研究者本身的參考架構 (frame of



reference) 著手，對社會經驗的研究才會有較深刻的瞭解與認識。因此，採用表意的、個例式(ideographic)的方法稱為後實證論(Harmon and Mayer, 1986:289-290; cf. 顏良恭, 1984:84)。另外，方法論又可分為二種：(一)指以專家的經驗作為後來學習者研究的指示，如哲學研究法，史學研究法等；(二)指一切學問的方法，在亞里斯多德的分析論、辯證論中已有記載，凡以言論理者即指方法論，而目前方法論的問題在於各科學是否可使用同一種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科學上其標準為何？換言之，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結果是否可以共同的標準進行判斷，這也是眾說紛紜難以定論的(商務印書館，哲學辭典，1988:66)。

肆、實證理論的析論

一、實證論的歷史來源

中古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產生兩股強烈的風尚：(一)反形而上哲學思維方式及其所建構的知識體系；(二)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優越性，開啟十五世紀研究思想的潮流。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首先提出「反形而上學」論調的人，他挑起經驗與理性之間爭議的問題，堅持經驗是形成知識唯一可靠的基礎，又說：「要了解大自然只是『想』還是不夠的，臆測、想像、抽象等方法，無法保證知識的正確，最重要的是經由理性的『實踐』去重建問題」(陳秉璋, 1984:49-64)。

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主張以歸納實驗方法取代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形而上學)的方法；加利略(Galies)主張以數量計算的公式描述自然法則及其規則之間的變化；牛頓(Newton)則強調自然命題的實驗性而在學術界大放光明；霍布斯(Thomas Hobbs)採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的現象，並認為思想(think)、意識(consciousness)及心靈(mind)的研究，可以採用類似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孔德(Auguste Comte)認為，人類現象的研究與自然科學所採用的科學實證的方法相似，並指出消極的、虛幻的哲學思考應該予以拋棄；彌爾(John Stuart Mill)提供經驗主義作為知識基礎，認為只有採用物理科學的方法，才能矯正道德科學中人類現象的研究。顏良恭(1994:156)認為邏輯實證論在本世紀初到中葉，曾主宰英美的哲學思想，原為解釋自然科學的基礎，後來滲透到人文、社會



科學，在心理學方面產生了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與操作主義 (operationalism)。綜合言之，研究人類心靈發展的方法，經過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即神學階段、哲學階段、實證論的階段 (Pringogine, 1984: 15-20)。

二、實證論的主題、基本假定、共同特徵

一般而言，傳統的實證論環繞著三個實證論的主題，他們主張：(一) 所有形上學的知識應被排除，知識僅限於已經驗的或可經驗的事務；(二) 妥適的知識是能對科學作解釋，因而使知識能夠增加；(三) 科學的解釋規則，只限於功能性的、直接的規則或數學規則。實證論強調所有人類的問題，都可以透過一個正確的方法而獲得解決，形上學不僅是錯誤且有礙社會科學的進步。實證論認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藉用科技的方法探討社會的問題，以確保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進步。

綜合而言，實證論的基本假設有下列八項：

- 1、實證論的方法同時適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運用嚴格的自然科學方法來處理社會現象的各種問題；
- 2、對社會行動者的行為進行分離且客觀的觀察，是發現科學知識最確切的途徑；
- 3、將事實與價值分開，區分為實然與應然，為了陳述事實真，社會科學家不預設、也不能加入自己的價值判斷；
- 4、科學家的扮演的角色只是為了創造知識，然而，所產生的理論與實存的關係淡薄並不是科學家的責任，科學家對此無興趣處理；
- 5、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建立通則，以解釋、預測、控制人類行為(顏良恭，1994: 156-157)；
- 6、外在世界的現象是獨立於人類的存在而存在的，這是簡單實在論的觀點 (simple realism)；
- 7、人類對事物的感官知覺是相同的，實證論者認為感官是客觀的或互為主觀 (Objectivity or intersubjectivity of Sense Perception) ；
- 8、實證論者認為人類語句的真假，取決於其所描述的外在世界是否與之吻合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阮新邦（1993：9-28）看到實證論者所持論點有很多共同特徵，例如，使用自然科學的模式研究社會現象，目的在於確立客觀的社會規則和知識；採用事實和價值分開的價值觀，主張事實可以客觀驗證，而價值是為主觀的選擇沒有真假可言；認為實證論提供一個客觀研究程序以檢視各種研究方法、技巧與研究的結果。

但是，陳秉璋（1994：49-64）則認為，實證論者看不起所有形而上哲學的思維方式，以及純粹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論述，堅決的主張並相信感官經驗(sensory experience)的優越性，以邏輯演繹與推理的方法，替代傳統人生哲學的想像與臆測。

三、實證論使用的方法、原因、影響、批判

（一）實證論者採用的方法

實證論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本質，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差異，鼓吹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探究社會科學的各種現象與問題，因此，在學術界很快的成為主流的科學，而主流的實證社會科學使用的方法有下列四項（阮新邦，1993：1-7）；

- 1、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2、
- 2、大量運用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主張研究程序可重複(reliability)使用；
- 3、研究的結果具有可驗證性(verifiability)；
- 4、預設因果關係的研究模式(casual modle of explanation)。

（二）實證論者採用量化研究的原因

實證論者採用量的研究方法方面，吾人發現，實證論主張社會科學應該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的原因，歸納為下列八點（江明修，1992：324）：

- 1、社會現象錯綜萬端，不論是時、空、人、事、物方面皆相互發生影響，量化的研究方法，歸納、分析、簡化複雜的研究現象，幫助研究者更容易處理各種社會的問題；
- 2、主張以數據來突顯問題的重要，以引起社會大眾對問題嚴重性的注意與關切；
- 3、量化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系統性的資料搜集方法；



- 4、採用統計分析的方法，使資料的分析更為深入；
- 5、可經由發現通則的方式，了解社會問題的現況，並預測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與目標；
- 6、量化的研究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反覆的驗證某一研究的結果，使得研究的發現能更為正確的呈現；
- 7、量化的研究方法比叫容易教學傳授學生使用；
- 8、量化研究的結果較具說服力，由於一般人認為數字比較客觀，又一般人對統計的方法也不太了解。

（三）實證論對社會科學所產生的影響

在實證論對社會科學研究所產生的影響方面，吾人由Richard J. Bernstein (1982：6-7)的文章中發現，實證論者對社會科學研究結果所產生的影響有下列幾項：

- 1、實證論提供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研究理論基礎，透過自然科學的經驗方式，完成專業的和科學的社會經驗的基礎研究；
- 2、實證論者認為，偉大的政治哲學和社會思想的傳統已經滅亡；自然科學的研究幫助人類知識的成長，但是，它會破壞傳統的哲學與社會的研究；
- 3、實證論主流的科學家相信，在二十一世紀時研究人類複雜關係的科學研究已經發生；而整個傾向於發展一個明確的、正確的、一致的規則，用經驗、驗證的觀點澄清社會科學研究的邏輯和知識的特點；
- 4、建立一種像好的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
- 5、闡明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在經驗理論的研究方面上；
- 6、實證論深深的影響社會科學，也影響社會科學哲學家的研究與世界觀。

（四）對實證論者的批判

胡賽爾(Edmund Husserl)的現象學(張慶熊譯，1994，pxv)針對實證主義提出批判，其主要理由可以綜合如下：

- 1、斷定社會科學的量化研究已陷入危機，因為實證研究無可靠的研究基礎，無法經由自己的努力克服各種研究的困難，因此，需要現象學的研究在方法論及研究架構來指導改造社會科學量化研究。
- 2、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客觀的，由事實的面向出發，現象學則以主觀的、不證自明的主觀觀念從事研究社會現象。
- 3、認為檢驗科學真理的唯一標準是科學實驗，但是，胡賽爾的現象學不考慮以實驗來檢驗真理。
- 4、科學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不應做價值的判斷，因為，人類文化的構造是不理性的，客觀的真理只存在物理的世界而獲得確證，精神世界的現象學把人類主體的本性，當作研究的中心，把價值和意義的問題，當作研究的重點。
- 5、社會科學研究應主張存有和存有的秩序，以及精神和物質關係的問題不能由事實的控制而做出結論，逕而排斥形上學的研究，胡賽爾主張，形上學的精神決定其他社會科學所提供的知識，同樣具有最終的意義。

伍、後實證論的崛起

一、詮釋理論(Phenomenological Alternative)的析論

(一)、詮釋理論歷史根源

關於詮釋學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時候，希臘文已經出現「詮釋學」(hermeneutic)的詞彙，「詮釋」指人類如何將不清晰、不明確的訊息解釋得清楚以獲得更深層的理解。而在中世紀時解釋聖經以及對法律條文解釋的活動非常活躍，於是有專門探討「解釋」和「理解」之間的學問產生。於十八世紀末「詮釋學」卻仍只侷限於宗教和法學的研究領域，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才將詮釋學帶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由於狄爾泰認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本質不同，因而彼此之間應該有一個清晰的界限，所以，狄爾泰主張人文社會科學其重點在「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ing)而非「解釋」(Erklärung/explanation) (阮新邦1，993：105-106)。



康德(Kant)主張宇宙最終的實體在「精神」或「觀念」或「人類意識」而不是感官經驗，主張先驗的知識(a priori knowledge)是獨立於外在的實體，而存在於內心的，它被視為精神(mind)的產物，所以，詮釋的過程就是在先驗知識之內，對人類生存世界的經驗實體與先驗的知識運作與互動之下所產生的；因此，這個世界是從精神的或直觀的領域出發，這個主張是德國觀念論者的基本假定。另外，顏良恭(1994：158-159)也指出，詮釋學理論係受到德國觀念論(Idealism)的影響，相對於實證論所主張的感官經驗(sensory experience)為社會科學知識基礎的論點。

(二)、詮釋學的基本假定、方法

詮釋學的基本假定與方法為何？吾人在吳瓊恩(1993：226-229)《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中，看到詮釋學的假設可歸納為下列五種情況：

- 1、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大不相同的，因為，研究人文社會科學是要從行動者心理內層去了解，經由外層把握到內心世界，自然科學只是對物理現象的認識而已；
- 2、反對實證論「價值中立」的觀點，因為，研究者主動觀察世界的動因，是獲得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方法，反對實證論建立「通則」(nomothetic)的方法，因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是自由的，不受物理世界的束縛，它講求研究對象的個例性(Ideographic)；
- 3、認為社會環境並非客觀存在的實體，是由人的經驗相互主觀的互動下所建構出來的；
- 4、強調語言在社會互動過程的重要，在同樣的社會秩序下，為不同的成員創造了相互理解的條件；
- 5、強調哲學與社會科學是不可分割的，強著重研究行動者對社會實體的「建構意義」(constitutive meaning)。

詮釋學的研究又稱之為行動理論的研究，行動(action)是有意識的及意向的(intentional)；但是，行為(behavior)沒有任何的意識與意向，詮釋學主張社會行動是社會建構的來源，可與他人分享共同的規範、規則、價值與期望；因此，行動理論與實證論不同，實證論是研究社會問題現象的因果關係的解釋，行動理論研究

則注重研究者的研究意向與意識的詮釋，而實證論卻故意的忽略研究的規範、規則、價值與期望。行動理論研究則不然，行動理論的研究，要求行動者自己界定問題的情境，並尋求研究的改變，詮釋學家認為實證論不符合行動研究者的要求，因為詮釋學的方法主要是在解釋、理解與批判社會問題。因此，詮釋學到底是什麼？簡單的說，它是一種對任何符號，不管是語言的或非語言的符號，作解釋、理解與批判的學問（顏良恭，1994：161-162）。

（三）、詮釋理論主要思想家與其批判

Richard J Bernstein(1982：118-121)認為社會科學的傳統，就是把人類當作不同的複雜程度的物理系統，並以唯物機械觀(materialism mechanism)的觀點，掌握描述解釋這個世界，並在自然的情況之下解釋人類到底是什麼？並且說社會科學告訴了我們真實世界的存在。於是，Richard J Bernstein對社會科學的唯物論、化約論的限制進行批判，並了解人類的社會世界被扭曲的狀況為何？因為人類的想像力是打開社會科學被束縛的工具。於是，為了對實證論的政治和社會科學進行批判，首先要面對的是認識論(epistemological)及形上學(metaphysical)的議題。

在批判政治和社會科學使用自然科學律則之前，有二位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一位是(Wilfrid Sellars)美國人謝拉斯；一位就是德國人(Edmund Husserl)胡賽爾。Sellars 是有野心的人物，其哲學歷史觀就是要發展一個微妙的(subtle)和精巧(sophisticated)的人類社會世界的綱領，對主流社會科學家所使用的自然律則觀點加以批判，另一方面 Husserl 的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的分析哲學，改造了當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潮，並且把焦點集中在激進(radical)的批判理論的基礎上(Ibid.：117-118)。

因此，Richard J Bernstein 認為，Wilfrid Sellars 採用二個方式了解人類社會世界(man-in-the world)，其一、在哲學上稱為想像的方法，他認為不要拒絕任何一個對社會實體的想像；其二、受到 Edmund Husserl 影響的觀念，開啟了轉換、反省(reflection)和評估(evaluation)客觀世界的經驗哲學(Ibid.：126)。

另外，對於Edmund Husserl的看法而言，Richard J Bernstein則認為，Edmund Husserl係以人類社會生活世界的總和為社會實體的整體，這種見解與 Wilfrid

Sellars的看法不同，因為Edmund Husserl經由對現象的理解開始進行研究，他知道有一個客觀的科學的世界，以及架托現象與客觀世界二者的架構，他停止判斷實體的測試與建構世界的意義，他認為客觀的社會科學的本質，就是運用數理和理念瞭解人類社會的世界。Husserl認為人類心理的現象結構應該是在主觀的事件上用想像力去描述的一種心理模型，它是人類知覺的基礎對象，立基於人類自然的心理的態度(Ibid.：135-136)。

吳瓊恩(1993：240-241)認為，詮釋論者反對實證論的主張，比激進的批判理論較為保守的。因此，吾人在Brain Fay的研究中，發現其對詮釋學的限制提出三點批判：

- 1、詮釋學強調人類具有主動能力，詮釋其所處在環境，但其所強調的因果關係，僅是近似的因果關係(quasicausal relationship)，是經過辯解或解釋後的條件(warranting conditions)，除了研究行動的意義外，應探討支持意義繼續存在的因果因素為何？
- 2、僅對行動意義面向提出說明，未就行動後的後果提出說明；
- 3、對社會內部結構的衝突、原因、規則、行動、共同意義間的因果關係，並未加以說明分析，缺乏對歷史變遷的解釋，未說明如何溝通才不會發生溝通的扭曲，亦有系統的忽略社會內部可能的衝突結構。

因此，Bernstein(1982：169)認為，社會科學理論的任務，就是告訴大家瞭解能夠了解多樣化的人生，這也是現象學詮釋人類社會生活中心的重點所在。

二、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析論

(一)、批判理論歷史淵源

批判理論源自於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學者，例如，霍克海墨(Max Horkheimer)、阿多諾(Thodor W. Adorno)、班杰明(Walter Benjamin)、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其中霍克海墨(Max Horkheimer)是首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所長，該研究所創立於一九二三年的格倫堡(Carl Grunberg)，而霍克海墨(Max Horkheimer)是一位「奧地利的馬克斯主義」(Austrian Marxism)的歷史學家，在一九三〇年代霍克海墨(Max Horkheimer)出任該研究所的所長時，對當



時的社會科學，被分解為彼此相互分離零散的社會科學感到憂心，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對社會問題作深層的研究也感到深度的不滿，於是進而創立了「社會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的新理論，他把哲學、經濟學以及其他的理論結合起來，因此，又稱為「批判的馬克斯主義」(Critical Maxism) (劉少杰，1993：19)。

顏良恭 (1994：164) 認為，批判理論主要繼承康德(Immanuel Kant) 和黑格爾(G·W·F·Hegel)的批判傳統，主張宇宙實體的性質是屬於精神的而不是物質，雖然詮釋學強調人類對事物理解的過程，批判理論則強調整個社會實體的批判過程，並將焦點集中在人類的異化與人際間疏離的狀態。

阮邦新(1994：28-33)以為，康德的批判傳統主要在對於建構知識的條件進行批判，批判人類要如何理解外在的社會世界，如何把社會世界的資料有秩序的整理成為人類的知識？因此，康德的知識論的重點，在於找出在那些條件之下，可以使用人類的理性去認知社會世界真實的實體，而那些條件卻局限了人類理性的範圍。

所以，康德除了對建構知識的可能性批判外，亦對人類內在主體與外在被認知的世界客體批判，不同於黑格爾對社會實體加諸於人類的各種不平等的限制進行批判。黑格爾認為，這些不平等的限制是人為的，他強調個人主觀的演繹是可以改變社會實體的現狀，但這些制約的限制依然客觀的存在於人類的社會實體中。因此，黑格爾的「批判超越」的思維，被馬克斯批判為「唯心的超越」，並沒有改變客觀的人類社會實體的存在，充其量僅跨出超越的一小步，因為人類內在心理的改變，只能改變自己內心對社會實體的理解，不能對社會制度進行批判也無法改善社會實體的現狀，儼然是一種唯心的假象，所以人類社會各種不平等的限制依然存在 (阮邦新，1994：28-33)。

(二)、批判理論的理論基礎、特徵、對社會現象的看法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繼承自馬克斯的批判傳統，該學派主張社會研究必然隱含對社會實體的批判，強調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必須要自覺地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加入了價值的判斷，如果沒有社會價值的判斷，則將不能正確地了解社會問題的各種現象，此點主張與實證論者所強調的價值中立 (value free) 的社會科學研究

產生衝突，實證論者認為價值判斷是主觀的，而事實的陳述是客觀的，有了價值介入的社會科學研究必然妨礙社會科學研究的程序，進而影響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客觀性（阮新邦，1994：9-28）。

吳瓊恩(1993：334-338)認為，社會科學的批判理論思想，主要的特徵有下列五項，即：

- 1、反對社會科學理論的系統化、體系化；
- 2、不追求絕對的真理，採用辯證哲學的思考方式；
- 3、強調總體性(totality)的社會科學研究分析，重視社會實體所產生的異化與物化的問題，對社會實體所產生的影響。

阮新邦（1994：9-28）提出，社會科學批判理論，對社會各種問題所產生的現象的看法，他認為社會問題的現象，是由社會文化的意義與社會各種不同的價值所構成，強調研究者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涉入，因為，社會科學的現象無法像自然科學的現象一樣，獨立於人類社會的實存而存在；必須透過文化的社會化，而建立起人類自身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和了解；社會現象包含了文化的意義和社會的價值，也包含個人對自我的理解和解釋；因此，社會問題現象的構成，取決於人類如何使用語言來溝通與理解社會的現象；所以，社會問題的現象不是像實證論者所言，係獨立於人類社會的實存而存在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主觀演繹社會現象的過程也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

（三）、批判理論的思想家與其批判的見解與主張

批判理論重要的思想家，不外乎霍克海墨、哈伯瑪斯、馬庫色等學者專家，Richard J. Bernstein(1982：179)指出，霍克海墨(Max Horkheimer)是一位無神論者，他與Husserl所研究的社會科學基礎類似，但並不會比Husserl的研究表現遜色，霍克海墨反對實證論者的社會科學研究概念，對社會科學研究產生的限制，以及對邏輯實證論的客觀主義進行批判，對實證論者知覺理性生活本質的議題提出爭辯，主張邏輯實證論的理性概念是無理性(nonrational)的，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沒有純理論性的研究生活，不屑於Husserl現象學主張解救人類社會的錯覺，並根據黑格爾和馬克斯的理論，對社會科學的研究進一步的思考、發展與批判。

批判理論著名的代表人物首推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他是批判理論學派集大成者，一九五四年時，哈伯瑪斯以《絕對與歷史：論謝林思想中的內在衝突》取得博士論文，並畢業於德國波昂大學。Habermas企圖以更精緻的、系統化批判理論，使批判理論能推出與當代社會情境相互輝映的地位(孫善豪，1993：216-225)。

Habermas一九六一年提出批判理論的概念，一方面是要解除宰制的交談意志，另一方面對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對民主化意志束縛的命令提出批判，Habermas認為「公共領域」已被大眾新聞媒體所扭曲，因此，哈伯瑪斯對學生運動亦提出相當的批判，主張避免「無反省的實踐」導致社會秩序破壞的危險，Habermas在《知識與興趣》中提出三種建構社會科學理論主張，例如，技術控制興趣、實踐興趣及解放的興趣等，他認為這些興趣是抽象的、來自於社會勞動和語言的文化生活形式，因為人類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三種興趣，於是建立了社會科學的實證論、歷史詮釋論和批判理論(孫善豪，1993：216-225)。

馬庫色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因為他支持歐洲青年學生造反運動而蜚聲全球，他以馬克斯理論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吸收了黑格爾(Hegel)哲學、海德格(Martin Hidergger)的存在主義與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等理論而匯成一家之說，其批判理論形塑了面向人類社會生活現實及立足並超越社會現實的具體哲學，他以勞動的概念作為人本論的基礎，追求人生的真、善、美的理論辯證，並對當代工業文明社會進行批判，對官僚社會主義和不合理的資本主義，進行全面性的、深入的、嚴厲的批判(劉少杰，1993：3)。

批判理論的專家學者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的涉入即是指社會價值判斷的介入，係研究者如何理解社會實體的過程，批判人類社會理性的觀點及其理解社會實體的角度，批判理論專家認為對社會實體的理解，蘊涵著對人類社會實證論者個人所信守的理性觀進行的批判，顯示了社會科學研究或對人類社會人際現象的理解，應該如何、為何涉入價值判斷作出主張，這也就是批判理論學派的專家學者建構批判理論的依據所在(阮新邦，1993：40-54)。

陸、後實證論公共政策研究方法論

Frank Fisher (1998:129-130) 在《超越經驗主義：後實證主義者觀點的政策探究》中指出，新實證主義者的方法論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新實證主義的政策科學，主要在發展具有預測性的政策科學的通則建立，但是，這些努力已經逐漸的受到挫敗，且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也無法有效的解決社會的各種問題，而產生挫敗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新實證主義的方法論、認識論已經過時，運用於在社會科學的研究發展時，已經不能再獲得能被信賴的「客觀的」、「有證據依據的」傳統概念。因此，後實證主義論者，提出一個廣泛的研究釋意架構，提供社會科學家更好的研究方式。

Ann Chih Lin(1998:174) 在《搭建實證論者與詮釋論者質性研究方法的途徑》文獻中指出，公共政策的研究是一種相互溝通對話的研究，經由文獻的探討、比較的個案研究、探究性的研究、詮釋性研究、列出互補性研究的大綱，進行溝通、對話性的社會研究，經由此方式的進行，以獲得公共政策研究的真知灼見，這是一種不同於量化研究方法的另一種質性研究途徑。

後實證論者的研究方法論，是不談研究效度 (validity) 的，只談真實經驗的獲得，只要有短暫的美感及意義，人類的真誠性就會顯現，這就是後實證論的研究信度 (liability)，因為一個外在的實體沒有經過相互建構的過程，就不會產生研究的效度。實證論者所指的「內在效度」，是指研究結果與真實世界之間的差距有多大而言，「外在信度」則指研究發展社會科學的通則，據以主宰其他社會的研究領域。所以，在後實證論者的眼光中，實證論者的信度與效度的分析是沒有意義的。

表一：實證論與後實證論的研究方法論與技術的比較表：

後實證論者的研究	方法論	自然論
		詮釋論
	技術	宏觀：歷史詮釋分析
		微觀：田野調查
實證論者的研究	方法論	模仿自然科學的測量工具。
	技術	測量、預測、控制人類行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實證論的政策方案分析

Frank Fisher (1998: 130-131) 認為，實證論者的認識論係在提供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所需的方法，其觀點是指知識累積的途徑，在於透過各種社會科學客觀的假設，驗證社會實體中人類經驗的因果關係推論，其目標是建立一種跨越社會實體與歷史制度領域的通則。換言之，實證論者建立一種超越時、空限制而且放諸四海皆準的原理原則。

實證論者認為不論是對社區、社會文化、特定時間、地點或環境經驗的推論，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將「事實」與「價值」二分。因此，實證論者的政策科學，也區分事實與價值的研究，其主要的企圖在於政策分析的技術與其治理的形式，強調的重點在於，研究如何達成政治目標的方法，所以，許多的政策分析家採用標準的行政方法、定義行政、政治與政策的各種不同議題，並將之轉換為分析技術性的定義。但是，事實上，這種實證論的政策分析方式，由於受到人類經驗上的限制，必須做適當的修正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生存。

二、後實證論的政策方案分析

就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論上而言，政策規劃研究的方法論與政策評估的方法論，都可採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在政策規劃方面，其規劃的方法主要在於匯集政策分析家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因此，後實證論者的政策規劃方法論，就是一種互動、溝通的方法論，但是，實證論者的政策規劃方法，則是一個人關起門來完成公共政策的規劃，在沒有任何相關資訊的提供情況下，做出公共政策的決定。就「後實證論」的政策規劃方法論而言，實證論者的「閉門造車」的宰制性的規劃，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實踐方式」，從此而獲得的知識，是沒有人類社會生活經驗的知識，它對人類社會科學研究是沒有幫助的。

David L. Weimer (1998: 117-119) 認為，後實證論者的政策規劃分析觀點，採取一種政策對話、溝通的方式進行的，並不是以客觀的假設，驗證人類社會經驗的因果關係推論，或是建立一種跨越社會（空間）與歷史（時間）領域的通則。因為政策規劃的目標，本身就包含了社會的各種不同價值。所以，在界定政策目標時，遇到社會不同價值的相互衝突問題時，政策分析家必須透過對話、溝通的方式，將



相關的利害關係人納入進來，參與政策制定的互動、溝通過程，誠懇的理解利害關係人的內心深處的聲音、看法與需求。

換言之，後實證主義者的政策分析，必須採用更為廣博的方式，界定、分析政策規劃方案的目標，尤其是，那些未受重視者的不同聲音，找尋這些聲音並納入政策規劃分析的目標中，只有透過不斷的溝通、對話過程，政策分析家與利害關係人才能真正的瞭解對方的立場，使政策規劃有可能能進一步的達成共識。

三、後實證論對實證經驗主義的批評

Frank Fisher (1998: 131-135) 指出，後實證主義者受到量子力學、混沌理論及生物學進化論的影響而獲得瞭解，並指出原子式的實體，在社會整體的各個層級上面，仍然受到其他社會現象的影響，因此，原子的運作過程已不是確定的、明確的、一層不變的。後實證論者提出這個觀點，主要在解釋物理學家觀察物理現象時，粒子運動的最重要之處，在於物理被觀察的那一點上，換句話說，吾人在解釋社會世界時，我們所處的立場、位置，會影響我們所看到的社會世界的內容。隨著這些內容的發現，吾人認識到實證論者所主張的認識論的起點，是從資料累積與解釋的觀察與假設上，經由這些觀察與假設，發展社會現象的內容，建立社會文化理論的各種不同假定。由此，我們也可看到社會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理論與實務問題的判斷、應用程度。

由於後實證論者認識到社會實體建構的本質，新實證主義論、否認論者不能夠再保有過去社會科學研究主流地位，因為，後實證論的研究者，所探求的經驗客體，是基於對我們人類自身的瞭解上，如果要完全將社會實體與所處的環境抽離，進行所謂的事實與價值分離的描述，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實證論者傳統上所主張的「事實」這一個事物已不復存在。

Peter Deleon (1998: 152) 引述Sabatier對實證論者的政策分析架構的批判有下列幾點：

- 1、實證論者的工具理性破壞了人類社會實際的、自然的、有意義的面向。
- 2、實證論者的工具理性是反民主的，侵犯了美國政治科學的起源。
- 3、實證論者的工具理性抑制人類社會中個人的發展。

- 4、實證論者具工具理性的政治機制，如果遇上了複雜的社會問題情境時，無法順利的解決社會問題，於是產生了沒有效率的政治機制的問題。
- 5、實證論者的工具理性無法正確有效的分析政策方案。
- 6、實證論者的工具理性無適當的、豐富的社會科學工具和方法，以從事社會科學研究。

為了能夠更清楚的瞭解實證論與後實證論之間的差異，吾人將實證論與後實證論者的比較分析如下：

- 1、在本體論的認知上，實證論者認為世界是客觀存在於你、我之外的，它是一種心物二元的世界觀，後實證論者認為，社會實體是存在你、我之間的，不是在於我們之外，而存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實體，這個社會實體是由我們相互主觀的溝通、互動、討論所達成的共識所建構而成的社會實體。
- 2、實證論者講究的是唯物論，後實證論者講究的是唯心論；
- 3、實證論對於人與人相互之間的關係，主張是彼此疏離的、冷漠的；後實證論者的看法，則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之間互動的、彼此的關懷、友愛與照護的，具有人類社會的慈悲的關懷與助人的熱情；
- 4、實證論者對於世界認知的標準是客觀的，後實證論者，認為認知世界的標準是相互主觀的。

四、後實證主義：根據證據來解讀

Frank Fisher (1998: 135-137) 認為，後實證主義論者的研究焦點，在於科學實體的項目超過實體的本身，科學項目是由觀察者不同的觀念所構成而成的，不論是在研究經驗方面、人類知覺能力的產生，其目標在於瞭解這些不同元素，是如何進行彼此之間相互的互動，以形成我們所謂的社會科學研究知識，為達成此一目的，經由實體連貫性的理論中，建構後實證論者的社會科學研究過程，此理論強調知識本身的暫時現及有限性，與實證主義論者所強調的永久性、放之四海皆準的通則，有很大顯著的不同之處。

相對照之下，後實證論者提出的命題是非決定性、非命定性的，社會實體的建構是在對於人類社會實體的問題或現象的解釋上，經過一系列的互動、推論、辯證所產生的知識，此類的知識是被吾人共同接受的信念，而非僅僅是實驗證明或證據而已。

五、邁向民主的政策科學

Frank Fisher (1998: 129-146) 以為，實證論者的政策分析模式，主要在支持制度的結構，實證論者的政策制定過程，轉換為一般化的、通則化的原理原則，以處理公共政策的分析、規劃、評估及執行等，然而，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分析模式，則要超越統治機構的技術效率、成本效益分析的目標，便利政治利益的評價與政治社群的需要，其中後實證論者與實證論者的政策規劃分析方法，最大的不同，乃在於描述人類是在何處產生了社會世界的印象？以及如何形成其偏好？

由於政策規劃分析的觀念，在幫助吾人觀察、串聯社會問題的不同方法論證，因此，政策評估必須包含政治社群思維和衝突的評價，最重要之處，係展現公民社會中的公民與決策制定的過程，以及公民在決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綜合而論，後實證論者的政策規劃、評估與執行，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進行的方式是由下而上的意見溝通與表達的方式，上位者要傾聽下層利害關係人的心聲，提供其廣泛參與政策論證過程的途徑，以進行相互主觀的互動、溝通與建構的方式，透過對話以達成相互主觀共識原則，據以制定社會所需的公共政策，而不是採用由上而下的政策規劃、評估執行方式，因為這是一種統治者宰制公民的方式，這是威權集權運作的方式，它是命令的、控制的公民的方式，會產生這二種截然不同的政策規劃方式，其主要的原因仍是在於二者採用不同的世界觀、研究方法論，以認識人類社會世界的實體所產生的結果。

柒、結語

最後，吾人認為實證論與後實證論公共政策研究方法論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演繹假設、歸納邏輯的角度不同。後實證論者認為，社會的實體是存在你、我之間，而非存在你、我之外，社會科學的人文現象不是物化的東西，被研究的對象也是人類社會世界的主體，而不是一種被觀察的客體，因此，使用共同參與的方式，



在你、我之間進行互動的溝通。所以，與實證論者不同就是在邏輯思考上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實證論者認為，世界是一個可以任意拆解又組合的機械體，是像時鐘一樣的機械體的觀念，可不斷的重新組裝、拆卸，這儼然是一種唯物的機械論觀點。

傳統的實證論的方法論，並沒有關注利害關係人，而後實證論者的方法論的目標在於發現社會，而不是驗證社會實體。不論是幸運的或是意外的發現，而創造了社會科學的理論，最重要之處，仍在於社會科學的理論，也需要在社會實體中去體驗才能獲得。這要比實證論者的演繹假設、歸納整合、解構或非解構的方法寬廣一點。因此，文學、宗教、非邏輯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可以在學術的研究領域上獲得承認，只要該資料能夠被學術社群所承認，憑直覺與冥想的資料也能得到應有的尊敬與重視。

所以，吾人對於公共政策方法論的反省，其目標在於透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瞭解、認識才能有比較清楚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輪廓。公共政策研究方法論，要以唯名論、採用共識建構的世界觀以理解社會實體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的問題與現象會比較好的，而唯名論的主張，就是在社會實體的現場學習，在社會實體共識的建構過程中，抱持謙卑的觀念，對人類社會物化、異化現象的問題進行理解，這樣才能做出最好的公共政策研究。因此，吾人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即是理論、方法論、也是知識論，其實這些都是相同的，所有社會文化的建構，多是理論的建構，而所建構的理論要能夠到真實的世界去讓它發揮效用。

（本文作者為國家文官培訓所專員，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



參考資料

- 樊先生，1915，商務印書館編纂，1988，*哲學辭典*，台灣商務印書館。
- 江明修，1993，〈社會科學多重典範的爭辯：試論質與量研究方法的整合〉，*政治大學學報*，第66期。
- 江明修，1997，*公共行政學研究方法論*，台北：政大書城：13-14.
- 沈清松，1993，〈詮釋學方法評析〉，*政大研究通訊*，創刊號。
- 阮新邦，1993，*批判詮釋論與社會研究*，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 吳瓊恩，1993，*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孫善豪，1993，*時代心靈之鑰--當代哲學思想家*，台北：正中書局。
- 張慶熊譯，1994，*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陳秉璋，1994，〈社會科學方法論：科學思考的邏輯爭議〉，*政大研究通訊*，第二期。
- 陳秉璋，1991，*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書局。
- 劉少杰，1993，*馬庫色批判與重建*，台北：唐山出版社。
- 顏良恭，1994，*典範概念與公共行政理論科學哲學的應用與反省*，台北：時英出版社。
- 黃瑞祺，1996，*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
- Bernstein,R.J, 1982,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2。
- Hanson, 1958, "Observation" , *Patterns of discovery*, London: Cambridge Univ. Press, 4-30
- Gareth Morgan, 1983, "Research strategies :modle of engagement " , Gareth Morgan edited, *Beyond method*,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Inc. 19:21.
- Fisher F., 1998, "Beyond Empiricism; Policy Inquiry in Post-positivist Perspective," ,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6(1):129-146.
- Weimer, D. L., 1998, "Policy Analysis and Evidence: A Perspective," ,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6(1):114-128.
- Peter deLeon, 1998, "Models of Policy Discourse: Insights versus



Prediction,” ,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6(1):147-161.

Ann Chih Lin, 1998, “Bridging Positivist and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Methods “,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6(1):162-180.

